回歸爲香港法律界提供更廣闊天地

黃英豪　全國政協委員　黃乾亨黃英豪律師事務所首席合夥人

回歸20周年之：大家談

隨着香港的回歸，香港原有法律體系和法治原則，除了一些抵觸基本法之外，基本上保留下來。同時，國家更全面支持香港法律界到內地發展，上世紀90年代初，在率先開放香港律師事務所到內地開設代表辦事處的基礎上，內地從2003年至今與香港簽署了CEPA及其10個補充協議，2015年還簽署了關於服務貿易的協議，共出台了涉及三大領域，共20多項專門措施，為香港律師進入內地、開拓法律專業服務市場提供了比外國律師更為寬鬆、便利的條件和渠道。近年來，國家推動「一帶一路」戰略，更為香港法律界的發展提供了更為廣闊的天地。

香港回歸繼續保持法治優勢

香港在1997年回歸，中國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並實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的方針政策，從法律的角度看，就是香港的法律體系的最頂層，由港英統治時期的《英皇制誥》和《皇室訓令》，改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同時，按照基本法第8條規定，香港原有法律，即普通法、衡平法、條例、附屬立法和習慣法，除了與基本法相抵觸或經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機關作出修改外，予以保留，令到香港的法治社會特色繼續保持，依法施政、依法辦事、尊重法治、維護法治等觀念和行為準則，繼續成為香港社會的核心價值。香港法律界在香港繼續發揮着重要的作用，據不完全統計，香港現有1200多家本地律師行以及70多家海外律師事務所經營業務，擁有1萬多名事務律師和大律師(訴訟律師)。全球50大律師行之中，已有超過半數在香港設有據點或與本地律師行有業務關係，眾多的法律人才雲集香港並展開法律服務，香港可以說是成為了國際上名列前茅的法律服務之都。

在國家支持下開展內地業務

與此同時，在國家的大力支持下，香港的法律界也積極開拓內地業務。內地的法律體系是屬於大陸法系，與香港所實施的普通法體系有所不同，但是，由於內地對外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需要，香港律師界在內地也大有用武之地。上世紀90年代初，國家首先開放香港的律師事務所在內地設立代表辦事處，本人當時就在上海開設了辦事處，為內地企業和有關人士到香港和海外發展提供法律服務。近年來，國家有關的政策不斷放寬，香港律師行在內地從設立辦事處，到能夠與內地律師事務所聯營，可做的業務越來越多，港人在通過內地的司法考試之後，也可以成為內地的律師。目前，香港的法律界主要是為內地企業提供走出去和引進來的法律服務，內地人士到海外投資、留學、定居等事項，也可以得到熟悉海外法律環境的香港法律界提供服務。以廣東為例，香港和廣東的律師界正在依託廣州南沙、深圳前海、珠海橫琴三個新區以及廣東自由貿易區的建設，不斷探索和加強全方位、多層次的交流與合作，成果相當顯著。

「一帶一路」將提供更廣闊空間

國家近年來大力推動「一帶一路」建設，這就更為香港法律界的發展，提供了更為廣闊的施展空間。「一帶一路」的重點之一，就是推動沿線各個國家和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以及產業合作，做到互聯互通，共同發展。這就需要包括法律專業服務在內的大量國際性專業中介及服務，為這些建設項目與產業合作提供保障。由於香港的法律制度和司法制度與國際接軌，擁有較高的聲譽和優良服務質素等優勢，完全可以成為「一帶一路」建設的法律支援服務中心。據了解，現在許多香港律師都在開設承接這方面的業務，有法律界人士也在倡議，發揮香港的綜合優勢，構建成為「一帶一路」的法律仲裁中心。這些都是很好的意見，期待國家能夠更加重視發揮香港法律界的作用。

總之，香港回歸20年，不僅基本保留了原有的法律體系和法治傳統。而且，在國家的支持下，法律界的發展空間已經超越了香港狹小地域的局限，未來還將隨着「一帶一路」建設的展開，其發展前景越來越廣闊，成果也將越來越豐碩。

改善九東民生是下屆政府重要任務

柯創盛　香港群策匯思主席、立法會議員

香港特別行政區經已成立20周年，在國家的支持，以及三任行政長官的努力下，香港維持繁榮穩定，保持國際都會的地位，國際競爭力進一步提高，國際金融中心、貿易中心、航運中心的地位更加鞏固。我參考過一些國際研究報告，很多學術機構和評級機構都認為香港是世界上最長壽、最自由、法治程度最高、最廉潔、治安最好、人權狀況最好、競爭力最高、失業率最低、擁有最多一流大學的地位之一！無疑，能夠在香港生活，成為香港人的一分子，是值得大家感恩和自豪的。

不過，實事求是地看，縱使香港的上層經濟狀況不錯，但香港仍有不少社會民生問題尚待解決，基層市民的生活急切需要改善，特區政府絕無自滿的條件。現時，香港經已是全球樓價最難負擔的地方，樓價與市民收入水平大大脫節；此外，香港也是全球貧富懸殊最嚴重的發達城市之一，堅尼系數已達0.539，僅次於紐約市。筆者記得，有銀行早前曾發表一個調查，顯示2016年21歲至79歲的香港人中，共有87.8萬名擁有百萬元以上流動資產的百萬富翁，至於流動資產逾千萬的港人，則有5.9萬名。在百萬富翁及千萬富翁逾90萬人的同時，香港卻依然有90多萬市民活於貧窮線以下，即月入低於3,800元的一人家庭；月入低於14,000元的三人家庭；月入低於17,600元的四人家庭。如何集中資源扶貧助弱，改善社會的貧富懸殊及住屋問題，絕對是新一屆政府重中之重的工作！

居民收入與第二個商業中心地位不匹配

作為九龍東的立法會議員，我特別重視九龍東的民生議題。現時，觀塘及黃大仙的公營醫療服務遠不足夠，黃大仙區內甚至沒有急症室服務！依據醫管局的數據，包括觀塘居民在內的九龍東醫院聯網，在8大專科門診中，有三類專科的穩定新症輪候時間是全港最長的，至於包括黃大仙居民在內的九龍中醫院聯網，則有兩類專科的穩定新症輪候時間達全港第二長，包括眼科和兒科等。在今年3月，我已在立法會提出《改善九龍東公營醫療服務》動議，並獲立法會通過。我會繼續跟進，督促政府切實改善九東公營醫療服務！

此外，香港早已決定把九龍東建設成香港第二個商業中心區，但觀塘卻是全港月入中位數最低的地方，黃大仙則是全港月入中位數倒數第二的地方，當區居民收入與香港第二個商業中心的地位可謂毫不匹配！我期望政府能改善九龍東區內的交通接駁，讓九東的商業區與住宅區的距離更近，方便區內居民上班，並提供更多優質的就業職位和經濟活動，改善九龍東的貧窮問題！

香港是個富裕的地方。在2017年首季，本港經濟按年增長達4.3%，特區政府連年錄得財政盈餘，財政儲備現已達1萬億港元左右，外匯儲備則達4,000億美元，位處全球前十名，特區政府有足夠的財政實力切實改善民生，做好精準扶貧的工作，進一步減少社會的貧窮人口，卻沒有任由貧窮問題進一步惡化的藉口！

對內地的偏見阻礙香港發展

張桂蘭　張學良基金會會長

「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在西方世界一片蕭條中，祖國的發展一日千里，在硬實力和軟實力上，跨越了西方定義的各種鴻溝，雙雙實現飛躍。中國人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為國家的進步感到驕傲和自豪。可是，我看到還有少數香港人尤其是反對派，仍然抱着對內地的偏見，對祖國的進步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對現實哀怨而不知恥，對未來曲解而不發奮。如此繼續下去，勢必成為時代的棄兒。

本港某富豪早年大量持有內地某世界知名互聯網企業的股票，但在該企業發展的關鍵時刻拋售殆盡，成為他有生以來投資上的最大遺憾。他承認沒有賭贏，而筆者認為是他對內地企業存有偏見導致了巨大的財富損失。有朋友到香港某品牌手機店調校手機應用，被店員指着手機上的一款有3億人正在使用的安全軟件說是「垃圾」，而這位應該受過一定業務訓練的店員卻不知道正是這款安全應用軟件最先監測出最近肆虐的病毒WannaCry，並以此在全球最先開發出清除病毒的軟件。

內地不存偏見　善於學習模仿和創新

一些媒體在報道內地時，總是喜歡撿負面的新聞來說事，即使有什麼必報不可的業績和成就，它們也會抽取一些網上的其它醜聞來補充平衡之。反對派們用其扭曲的思維不願意接納祖國的進步，而是將內地一些仍然存在的陋習和缺憾進行炒作、放大，以滿足其不想和不願了解內地的心態，且長期養成的自大、嬌寵、優越心態，殊不知這種井底蛙的心態漸漸成為香港發展的人為障礙，視而不見內地的進步而不去研究和借鑒。它們漠視內地高鐵、比亞迪電動巴士、網購等的存在和發展，漠視「滴滴打車」、共享單車、支付寶等手機應用技術的推廣，甚至內地遊客，乃至內地人才在香港各行業的參與，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他們思維的扭曲和打壓，更不用說向內地學習推動香港發展進步了。

相反，內地人對香港和世界其他國家的觀感卻客觀得多，取其利而避其弊，經過吸收和過濾，創新自己的發展模式，如不遺餘力地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等，由於不存偏見，善於學習模仿和創新，才有了多方面的長足進步。在「一國兩制」框架下，香港人對內地的偏見以及對自己的盲目優越感，將會導致故步自封，不思進取，在當今世界的發展趨勢中看不清前路，成為所謂價值觀的負累。當內地大踏步發展，我們如果不乘其東風，順勢發展自己，便不能保住我們的優勢和價值，東方之珠在我們手裡將會黯淡無光。

正如前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張浚生日前對媒體記者說的，香港人既要看到自己的優勢，同時不要迷戀過去的相對優勢；既不要自高自大，也不要妄自菲薄。筆者還想加一句，港人如果不改變對內地的偏見，繼續沉醉在自己的「軟實力」和「功勞簿」上，很快會被內地的全面發展拋離，成為「病樹」或「沉舟」就不足為奇了。

「蔡邦交」崩盤證明「台獨」死路一條

劉斯路　資深評論員

名家時評

中國和巴拿馬正式簽署建立外交關係的聯合公報。筆者相信，這只是蔡英文「邦交崩盤」潮的開始，其實北京已經給了她一年多時間，以完成「未完成的答卷」，承認「九二共識」，使兩岸關係回到之前馬英九時代所奠定的「一個中國」的政治基礎上。但是，蔡英文執迷不悟，錯判形勢，更高估「台獨」勢力，改變原來兩岸的默契。事實證明，「台獨」只有死路一條。

台灣失去巴拿馬這個重要的「邦交國」，引起島內震驚。前「副總統」呂秀蓮驚呼有「亡國」之感。她說，其實去年巴拿馬就非常危險，蔡英文去了一趟，但終於還是來了，未來「外交」還會有更多挫折。呂秀蓮指，扣除巴拿馬，台灣「邦交國」只剩20國，有國際影響力的國家都跟台灣說再見。國民黨「立委」許毓仁表示，去年5月，蔡英文才浩浩蕩蕩到巴拿馬訪問並且承諾給予更多的金援，如今巴拿馬說斷就斷，成蔡政府「外交」上的大挫敗。

但是，蔡英文還是口硬，稱「台灣不會在大陸打壓下屈服」。事實上，她不改變立場，台灣剩下的20個「邦交國」會像雪崩式地離蔡英文而去。包括巴拉圭、洪都拉斯、危地馬拉、多米尼加、薩爾瓦多、伯利茲、海地等南美國家，或者會與北京建交。國際社會的一句評論很寫實：「北京以絕對的實力碾壓蔡英文」。

對於「巴拿馬斷交」事件，台灣島內還在吵吵嚷嚷，忙着「分析原因」、「追查過錯」，指稱巴拿馬與中國大陸建交是基於龐大的經濟利益考慮。事實上，中國外交部長王毅的一段話，很有「內幕性」。他與巴拿馬副總統兼外長德聖馬洛簽署了中巴建交公報後，在一個公開場合對100多位外國駐華使節說，可能有人會問，這個事情是不是來得有些突然？其實不是。因為巴拿馬很多年前就有這樣的願望。他們希望能跟中國建立外交關係，他們希望做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已經做過的正確事情。特別是最近以來，巴拿馬方面的要求越來越迫切，願望也越來越強烈。因為巴拿馬意識到，同中國建交是大勢所趨，是人心所向，是歷史必然，早比晚好，快比慢好。所以，我們之間的談判進行得非常順利。巴拿馬方面沒有表現出任何猶豫觀望，沒有提出任何前提條件，也不存在任何的所謂「交易」。

料影響明年縣市長選舉

王毅外長的話，說明了幾個事實：第一，過去北京與馬英九政府的確有默契，即巴拿馬有意與北京建交，但是北京「禮讓了」；第二，北京的確給了蔡英文回答「未完成答卷」的時間，希望她能正確判斷形勢，改正錯誤，使兩岸關係回到「一個中國」的政治基礎上，但是蔡英文執迷不悟，誤判形勢，將北京的忍耐視為懦弱，以為北京怕引起台灣民眾反彈，不敢動台灣「邦交國」，蔡英文政府中人甚至囂張地說，即使台灣「零邦交」也不怕，美國新總統特朗普上台，蔡英文玩小動作，打了「一通電話」，就以為美國改變了「一個中國」的政策，沒想到特朗普政府後來不但重申「一中」原則，還押後對台軍售，而巴拿馬棄台而去，恰恰選在這個時間點；第三，隨着中國大陸綜合實力與日俱增，與台灣還有「邦交」關係的國家，早就認清現實，與蔡政府斷交是遲早的問題；第四，與台灣「邦交國」建交的主動權掌握在北京手上，而北京控制這一進程的節奏，為維護兩岸關係發展的最大利益，可有理有利有節進行，目標是打擊「台獨」勢力，推動島內健康力量成長。可以預料，這將影響明年島內縣市長選舉的結果。

值得一提的是，「台獨」勢力往往錯判形勢，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陳水扁執政8年，瘋狂搞法理「台獨」，結果大大壓縮了台灣的國際空間，美國指其是「麻煩製造者」，「邦交國」已丟了一批。現在，蔡英文又誤判形勢，其結果可能真的是「零邦交」。

■台灣媒體人員在台灣外事部門外國國旗展示區等候拍攝工作人員將巴拿馬國旗（右二）移除。

促基本法理論體系化　彰「一國兩制」生命力

陳曉鋒　城市智庫研究員　法學博士

中聯辦主任張曉明近日在一個基本法研討會上高度評價王叔文、蕭蔚雲、許崇德等老一輩法學泰斗在「一國兩制」實踐及基本法研究方面作出的突出貢獻，並呼籲法律學者加強研究，提高基本法理論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告慰老一輩基本法理論的奠基者。張曉明主任的講話也重申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上個月的講話是正本清源，要繼續堅定不移地全面準確貫徹落實基本法；加強基本法宣傳教育，維護基本法的權威；完善與基本法實施相關的制度和機制；加強基本法理論研究，健全基本法理論體系。

基本法是香港的法治基礎，保障了香港社會的穩定繁榮，對解決社會政治紛爭具有重大意義。因此，要正確理解認識基本法，基本法也需要更多的法律學者不斷加強研究，促進基本法理論體系化，彰顯「一國兩制」這一中國制度的強大生命力。如今，我國已經成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我們對中國道路、中國制度和中國模式也越來越充滿自信。

理論的提出和基本法的誕生

「一國兩制」理論是在上個世紀70時代末80年代初針對台灣問題提出的。「一國兩制」的出發點是，既要解決國家統一問題，又要考慮到兩岸在制度方面有極大乃至根本性的不同，對方不接受內地的這一套社會制度。因此，在一個國家的前提下，允許對方的資本主義制度在局部地區與國家主體實行的社會主義制度並存。1982年通過的憲法第62條第（十三）項規定全國人大有權「決定特別行政區的設立及其制度」，這也為我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後，設立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一國兩制」提供了最高法律依據。

回歸20年來，「一國兩制」從創造性構想變成深根的現實，已經取得舉世公認的階段性成功。第一是「一國兩制」從過去的作為一種實現國家統一的方案，到現在作為國家治理港澳的一套制度框架，並通過20年的實踐有生命力地完善自己的理論體系；第二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井水不犯河水」，到今天的「兩制」在許多方面互相借鑒，相輔相成；第三是回歸以來出現很多的問題和挑戰，但最終都能得到妥善解決，這恰恰顯示出「一國兩制」具有的強大生命力，而應對新情況、解決新問題，總結新經驗的過程，就是實踐到理論不斷發展和不斷完善的過程。

從歷史的角度來說，中國能夠在上個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制定這麼一部史無前例的法律是非常成功和了不起的。香港基本法起草歷時4年零8個月，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舉行了9次全體會議，兩次就草案內容在香港和全國其他地區廣泛徵求意見。香港還成立了一個民間的、有廣泛代表性的共180名成員組成的香港基本法諮詢委員會。鄧小平高度評價香港基本法的起草：「寫出了一部具有歷史意義和國際意義的法律著作，這是一個具有創造性的傑作」。

要強調「一國兩制」憲制原理

早在1987年，許崇德教授就思考並提出「一國兩制」實踐中可能會出現的一些前沿問題，他提出，「憲法是根本法，凡屬中國的公民，凡屬中國的領土，遵守憲法，概莫能外」。爾後又提出，「要像愛護生命一樣去維護基本法」。

因此，全面準確認識基本法，首先要全面準確認識中國憲法。憲法和基本法的之間關係是「母法」與「子法」的關係，基本法依據憲法制定，必須符合憲法的規定是共性。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序言明確規定，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特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的制度，以保障國家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的實施。可以說，王叔文、蕭蔚雲、許崇德等教授運用中國憲法的基本原則和原理，結合「一國兩制」的方針政策和特區的實際情況，提出了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一套論述，極大地豐富了中國憲法的理論。